

帝国远行

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与民族国家建构

李 涯/著



DIGUO YUANXING

Zhongguo Jindai Lvwaiyouji Yu Minzu Guojia Jiango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远行：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与民族国家建构/李涯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004-9817-9

I. ①帝… II. ①李… III. ①游记—文学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4898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大鹏设计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37 千字

定 价 4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问题的缘起	(1)
二 研究现状	(12)
三 论证设计	(16)
第一章 从“帝国天下”到“民族国家”:近代旅外游记的历史	
机缘	(19)
第一节 从“帝国天下”到“民族国家”	(20)
一 “帝国天下”	(20)
二 “民族国家”	(28)
三 从“帝国天下”到“民族国家”	(32)
第二节 近代旅外游记的缘起与发展	(40)
一 总理衙门的设立与近代旅外游记的诞生(1861—1875)	(40)
二 洋务运动的深入与近代旅外游记的发展(1876—1894)	(47)
三 政治制度改良与近代旅外游记的兴盛(1895—1911)	(58)
四 互竞的焦灼与近代旅外游记的大发展(1912—1927)	(66)
第二章 走向“世界”的彷徨:近代旅外游者的创作心态	(72)
第一节 古代旅外游记中的“天下”观	(72)
一 古代旅外游记简介	(73)
二 古代旅外游记中的“天下”观	(78)

第二节 “彷徨”:近代旅外游者的心态·····	(93)
一 矛盾的旅行:近代旅外游者对于出游的态度·····	(93)
二 自我形象的反思:近代旅外游者被注视后的自审·····	(100)
三 褒贬的犹疑:近代旅外游者对于西方文化的心态·····	(109)
第三章 “西方”图景:近代旅外游记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120)
第一节 世界地理形象与民族国家体系想象·····	(120)
一 地理述奇·····	(123)
二 地理知识的深入与运用·····	(133)
第二节 西方器物形象与民族国家物质想象·····	(144)
一 器物述奇·····	(146)
二 器物内涵的深化·····	(157)
第三节 西方制度形象与民族国家体制想象·····	(169)
一 制度述奇·····	(170)
二 制度考察的深入·····	(178)
第四节 西方“个人”形象与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	(205)
一 “个性”述奇·····	(207)
二 西方文化的深入理解·····	(213)
第四章 文体特征:近代旅外游记书写/传播与民族国家想象·····	(223)
第一节 官员游记的文体特征与民族国家想象·····	(224)
一 晚清官员旅外游记的文体特征与民族国家想象·····	(224)
二 晚清官员旅外游记的传播环境与民族国家想象·····	(241)
第二节 小说笔法与王韬游记的民族国家想象·····	(245)
一 小说笔法:王韬游记的文体特征·····	(246)
二 王韬旅外游记的传播环境与市民阶层的民族国家想象·····	(252)
第三节 “新文体”与梁启超旅外游记的民族国家想象·····	(261)
一 “笔锋常带感情”:梁启超“新文体”的文体特征·····	(262)
二 作为新文体的《新大陆游记》·····	(265)
三 梁启超游记的传播环境与民族国家想象·····	(270)
第四节 “人的文学”与五四旅外游记的民族国家想象·····	(272)

一 个体精神:五四时期旅外游记的文学氛围	(272)
二 抒写情感:五四时期旅外游记的书写特征	(278)
三 民初至五四旅外游记的传播环境与民族国家想象	(291)
 结语	 (299)
 参考文献	 (309)
 后记	 (326)

绪 论

一 问题的缘起

(一) 研究对象

本书研究的对象为中国近代旅外游记。这包含三个方面的范畴：一是“近代”；二是“旅外”；三是“游记”。以下分别论述。

第一，“近代”：旅外游记的时间范畴。一般而言，中国近代是指1840年到1919年。但是对于本书所言的旅外游记的开端与结尾，则是自1861年始而至1927年终。

从明代嘉靖朝开始，中国便开始了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这一政策基本上为清代统治者沿用。所以在清代前期和中期，很少有人漂洋出海，四方游历，更不用说还要留下多少旅外游记。即使有个别例外，也只能说是偶然，不能代表一种重要的趋势。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中国和西方国家必须互派使节。紧接着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中国与海外，主要是与西方列强的交流之门才被打开。西方国家强行向中国派驻外交人员。而清政府主要以总理衙门为主持机构也开始向海外派遣考察人员、留学生和外交使节，考察、学习以及办理外交事务。由此中国逐渐形成了一股宏大的出国热潮。许多出国人员用游记形式记录下了对西方的观察和感受。这就是近代旅外游记的兴起。由此可见，中国近代旅外游记的兴起并非开始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是开端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总理衙门建立之后的1861年。

一般政治史意义上的“近代”结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是对于文化和文学来说，整个20年代都还是五四运动的余绪。旅外游记也不例外。从民国初年一直到20年代末，旅外游记的主题既专注于个体意识和价值的追求，也包括了对英美或苏俄制度的选择的争论。这些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所以，本书的时间段的下限是1927年。

第二，“西方”：旅外游记的“外”。尽管近代旅外游记中还包括少数涉及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等地的游记。但是笔者认为，对中国影响和震撼最大的还是西方游记。西方以资本为核心从文艺复兴时期起便开始了大规模扩张行动，经过数百年的征服，建立起了一套以西方为标准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在19世纪中叶被强行纳入这个体系之初，对此还全然不能理解。1861年后的外派人员的根本任务就是全面了解西方世界，从而为中国的行动提供基本指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赴西方游历是整个旅外活动的核心，而西方游记当然亦是中国近代旅外游记的核心内容。

欧美为西方自不待言。俄罗斯虽然地跨亚欧，但是从彼得大帝开始，就力图融入西方，甚至有了与欧美争强的意图，逐渐具有一些西方的特征。因此本书也把俄罗斯游记纳入考察范围。此处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也包括了日本游记。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效仿西方改革，提出“脱亚入欧”，全面西化的口号。在亚洲，日本是最西化的国家，在它崛起之后，也参与到与西方列强竞争的行列中。清末，很多中国人正是通过日本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因此本书将日本游记列入研究范围。

第三，“游记”：如何认证哪些作品为旅外游记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来考察。

从“游记”的内容来看，根据记述内容的不同，游记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山水游记与综合考察性游记。山水游记指记述游览山川名胜为主要内容的游记作品。综合考察性游记，指那些记述综合考察过程中见闻为主要内容的纪游文章，它所记述的内容不仅包含山水名胜、风土人情，也包含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读后不仅可了解当地风貌物产，也了解当地历史社会状况等。^① 故近代以来，按散文的形式，记述游历异域时所见所闻

^① 韩玉奎：《山水游记探美》，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的,包括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作品,如出使记、访学记、游历记、考察记、漂泊记等各种旅行记都应该列为近代旅外游记范畴。

以上是从记述内容来谈的。从形式方面来看,游记是一种散文体式。但应该指出的是,本书研究的近代旅外游记属于广义的散文,包括笔记体、日记体、随笔体、杂记体等多种体裁形式。在个别旅外游记文本中,虽含有一些诗体或骈文、赋体(如林鍼的《西海纪游草》包含了若干纪游诗),但不能由于刻板的范围规定而生硬割裂完整的文本,所以这些诗赋骈文体裁的纪游文学也一并纳入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

另外,游记应该是作者所亲历的,或者是由亲历者口述,而作者记录而成。至于非作者亲历的作品,如《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使法事略》等,虽记录了李鸿章访问西方各国的经历,但并非李氏口述,且作者系美国人,故不将类似上述作品列入论述范畴。

(二) 研究视角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内忧而外患。然而,国门虽被迫为西方洞开,但长期与世隔绝的中国人,或为朝廷派遣、或为求知求学、或为出外谋生而有了机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体验西方文明;转而认识自己、构建振兴中华之蓝图。中国这批最早站在最前沿接触到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的游者,用“游记”文体或如实或创造地记录下了使自己备受冲击的西方形象。这些西方形象,反映出的是记述者的一种关于中国转型的焦灼感。即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转变成一个现代性的国家形态。而这种现代性的国家形态,就是自西方起源而逐步扩展至全球的民族国家形态。

因此,本书选取“民族国家想象”为视角来展开对近代旅外游记的研究。首先要说明的是,“民族国家想象”是一种现代性体验。何谓现代性体验呢?这要先从“现代性”谈起。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现代性是:“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其显著特征是“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

族国家”等。^①这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现代性。

而刘小枫在研究现代性问题时把现代性放在“现代学”内加以讨论。他认为，现代学包括三个题域：“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②。这即是说，他认为现代性不仅是一种社会物质层面的转变，也是人对这种转变的一种体验。

同样，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也是从心理体验的层面界说和描述现代性：“今天，全世界的男女们都共享着一种重要的经验——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我将这种经验称作‘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的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的环境和经验直接跨越了一切地理的和民族的、阶级的和国籍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把全人类都统一到了一起。”^③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现代性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是对这一历史巨变的特定体验。

以上两种类型的看法其实可以统一起来这样表述：现代性既包括客观的历史转型，同样也是对这种巨大转型的感受和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称之为现代性体验。

这是相对于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而言。如果落实到中国，现代性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

相对于西方“早发内生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是“后发外源型”的，其现代性的面貌、来源和发展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正如李欧梵所认为的那样：“多种现代性理论已经脱离了西方一元化、霸权式的理论体系，

① [英]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②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③ [美]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导论，第15页。

多种现代性理论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① 因此，对中国而言，现代性的特征呈现出与西方相异的面貌：以泰勒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工具理性是西方现代性转型的根源。“合理化”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有了这样的内驱力，现代科学、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民族国家也由此产生。^② 这是西方的情况。对于中国来说，以上的这种因果关系是相反的。现代性对中国最初的、最直观的刺激并不是作为思维结构的“理性化”问题，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刘小枫指出：“民族比较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处境，亦是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基本问题所在。”^③ 在与西方冲突中，中国战败受辱，帝国体系崩溃，被强行纳入到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即从“天下”到“世界”。^④ 为了在世界现代民族国家的行列中寻得一席之地，为了改变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现状，实现振兴中华、富国强兵的梦想，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唯一的选择。正如梁启超所疾呼：“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国家而已。”^⑤ 而“在清末以来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正是追求现代性的第一要义”^⑥。

王一川如此定义中国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主要是指中国社会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古典性文化衰败而自身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急需重建的情势下，参照西方现代性指标而建立的一整套行为制度和模式。”^⑦ 在此基础上，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行为制度和模式，即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内容的。

故此，中国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上，而中国人的现代性体验，即对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新的社会模式的一种体验和感受。正如李欧梵所认为的，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在其影响之

① 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1页。

② 转引自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③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4页。

④ 参见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16页。

⑤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02页。

⑥ 张志忠：《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文史哲》2006年第1期，第82页。

⑦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下产生的民族国家的想象。^①

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民族国家不仅是现代主体不可忽视的内容，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是唯一的、绝对的现代主体，它重构了中国人关于自我与世界秩序的印象，也构筑了文学最基本的想象空间。因此，民族国家想象是我们考察现代性与文学关系首要面对的。^②

因此，本书具体选取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主要类型——“民族国家想象”来作为观照近代旅外游记的视角。本书所谓的“民族国家想象”，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层“想象”是一种观念，是旅外游记中通过对西方各个层面形象的描写而获得的对民族国家的形象化理解。也就是对“民族国家”是什么的形象化解释。

第二层“想象”是一种建构，是把中国建构为民族国家的过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步论、民族国家概念、基于普遍性的个性观念，都常常被冠以“想象的”加以修饰，旨在强调它的形而上学“建构—创造”特性，并以此肯认现代性的动力性特征^③。本书认为民族国家的产生既是一个“想象”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现实的“创造”或“建构”的过程。观念想象与实体建构应该是互动相成，共同推动民族国家形成的。

（三）研究意义

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入手研究近代旅外游记，既可为研究近代旅外游记提供一定的思路与视角，又可以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研究提供一点补充；第二，体现了比较文学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学科价值。这两个方面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跨界”中：

① 参见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第131页。

② 王宁：《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与性别的文化象征》，《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24页。

③ 参见蔡江珍《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 近代旅外游记中包含着“中西文明跨界”

中西文明的交流古已有之。汉代丝绸之路连接了东西方的文明，唐代长安已经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西方的基督教（景教）也开始传入中国。至明代，传教士大批来华，带来了许多西方的地理、科学和宗教知识。尽管从嘉靖年间开始实行海禁，闭关锁国，但西方文化传入的势头一直持续到清代的康熙朝。不过这样的交流并没有构成中西文化主体之间的直接碰撞与沟通。直到乾隆朝，英国马嘎尔尼访华，因礼仪等问题与中国产生分歧，中西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对抗性交流才初露端倪。这次“礼仪之争”从中国一方来说似乎只不过是对外小邦的一次小小的教育而已（算是自古便有的“以夏变夷”的惯例）。但殊不知对于西方来讲则是其资本主义体系向全世界扩张的一次努力，马嘎尔尼的“失败”只是“资本”在行进路上的一次小小的失利，它扩张的本性使之决不会放弃。于是在一百年后，它终于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时中国文化面对的不再是西方文化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是作为整体的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体系。这样的面对也不再是和平友好的交流，而是强行被灌注，逼迫中国承认并接受西方的文明规则。在这一过程的开始阶段，中国人并不愿意承认这一切：“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①

由于不能获得期待的利益，西方不断发动战争，终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迫使中国正视西方体系。按照蒋廷黻的说法就是“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由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②。可以说，中国这时才第一次意识到所面对的西方是与自己充满巨大差异的文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慈禧与咸丰帝逃亡西安，留下恭亲王奕訢与攻入北京的英法联军交涉。奕訢带着必死之心留下来。但是没想到，英法军队在签订条约之后，居然遵约退兵。这让奕訢等人意识到，西方人的行事规则和中国人并不相同。在随后的一封奏折中，他写道：“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又可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② 同上。

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①在这段话中，奕訢虽然还是称西方人为“夷”，同时轻蔑地表示可以“驯服其性”，但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西方人的行事方式“似与前代之事稍异”。就在同一份奏折中，以他为代表的大臣们请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要求派“认识外国文字，通晓外国语言之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中国最高统治者此时已经不得不直面西方文明，并注意到，现在要“自图振兴”必须从了解西方开始。从此以后，海禁开放，中国开始向海外派遣使节、考察团以及留学生。这些最先走向西方的中国人身负着最为急迫的使命——了解西方，因此自然以最为写实的笔记记录所见所闻——这些见闻包括地理奇观、物质器用、制度体系和人伦文化等方方面面。在观察的过程中，游记作者还时时注意将眼前的事物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比较，品评优劣。在比较中，他们开始思考西方，认识西方。而这些对西方的了解也最终修改了他们的知识结构。

但是，这一过程并非如一般的增长见识那样顺利和愉快。这涉及中西文明之间的优劣比较。而比较的过程正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结构遭到怀疑，开始瓦解的过程。旅外者内心的焦灼和痛苦或许并非今日中国人所能体会。（笔者注意到，晚清好些旅外游者归国后不久便辞世，尽管无法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加以实证的考察，但在他们的旅外游记中所流露出的身心俱疲的焦灼与忧虑却无疑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②。）

2. 近代旅外游记中包含着“古代与现代的跨界”

本书选取的近代旅外游记所跨越的时间段是1861年到1927年，这个阶段正是中国从古代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阶段。可以说，这个阶段是中国文化从想象的“普遍性”过渡到“特殊性”甚至是“边缘性”，并开始重新寻求“普遍性”的阶段。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一书中谈到：“每一种文化和价值体系在其原初的自我理解上都是普遍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4页。

^② 在出使官员的旅外游记中，多可以发现对自己身体状况不适的记述。例如在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出国后始终心情烦忧，导致身体每况愈下，疾病缠身，回国两年多时间便病逝，终年51岁。而在他的日记中，也多有出使随行人员病逝的记录。再如，薛福成也有一腔报国热诚，但在出使回国不到一个月便病逝，终年57岁。可以认为，他们在旅外游记中心身俱疲的焦灼与忧虑确实影响到了他们的健康。

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发展把这种自在的普遍性表述统统变成了‘特殊’、‘局部’的东西。”^① 张旭东在这里谈到了资本主义。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所谓“现代”,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资本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从古典进入现代的过程,也就是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过程。

这里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资本主义原本是欧洲文艺复兴前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它原本只是一种“地方性”和“特殊性”。但是,随着资本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急剧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伸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原本的“特殊性”也就变成了“普遍性”,原本只是属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体系也就变成了世界所有文明“必然”要出现的“普遍”原则。^② 可以说,在实力的较量中,话语权被强势的资本主义获得,于是“现代”也就由资本主义所标志。

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及其所支持的价值体系来自于西方,所以,“现代”在被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就被等同于西方。尽管在主张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很多学者极力地反对这种话语霸权,但是如果回到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就不能不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就是西方,至少我们想象的现代是以西方为模式的。这样一来,旅外游记中涉及的古典与现代的跨界问题便和前面谈到的中西方文化的跨界是相互关联的。近代以来中国人到西方游历,他们眼中的西方是已经进入现代的西方,是已经把自己的“特殊性”变成“普遍性”的西方。这些中国人逐渐承认并力图实现的现代范本就是西方的现

①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②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讨论了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兴起的原因,同时又在《儒教与道教》中讨论了中国为何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可以说,韦伯的论述证明了资本主义原本的“特殊性”。卡尔·马克思提出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进化理论。认为人类任何文明都将经历这样五种社会形态。这种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扩展的结果而言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及其文化价值体系已经获得了“普遍性”的现状。但是他忽略了资本主义起源阶段所具有的“特殊性”。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如果没有西方的冲击,同样会发展起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每一种文化必然经过的阶段,具有“普遍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按照他们的论述,中国明代中后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代。再加上线性的历史进化论的引入，中国—古代—落后/西方—现代—先进的模式便形成了。

同时，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谈到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等级分明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核心国家是西方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而那些被强行纳入这个世界体系的国家则处在边缘和半边缘状态，深受核心国家的剥削和压榨。中国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当然属于这种边缘状态。近代那些最先访问西方的游者也最先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注意到，在现代世界中，中国不仅丧失了古代的核心地位（天朝上国），甚至连和西方民族国家平等对待的地位也难以取得。巨大的落差在旅外游者的心中当然会引起巨大痛苦，同时也会激起他们追赶西方的决心。这样的认识和决心迟早会反馈到中国国内，推动中国主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

3. 近代旅外游记包含着“文学和历史的学科跨界”

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近代旅外游记处在中国文学观念从古典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从古代的文史哲不分的泛文学观念，到现代以审美为标准的作为艺术门类的文学观念。所谓“文学”，在古代几乎可以包含所有的文献资料，经史子集四部都可称之为“文学”。但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美学思想的传入，特别是王国维等人对艺术审美自律的主张，文学被逐渐限定在以审美为标准的艺术门类中。讨论文学一定会涉及它的审美问题。对于“游记”这一文类，古今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在古代目录中，游记专著基本属于“史部”，大部分被编入别史、传记、地理类目，认为它主要具有的是史料价值。但是现代对游记看法却出现了变化，如《中国游记文学史》认为，游记是：“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以轻快的笔调，生动的描写，记述旅途中的见闻，某地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①可见人们明确地将游记归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类。

可以看出，古代将游记归于史部，强调的是作品的史料价值，而现代

① 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第2页。

将游记归于现代文学的一类，强调的是作品的审美价值。这种不同的偏重自然会对古今游记的创作带来相当大影响：古代游记相对较为平实，而现代游记则特别注意灌注旅行审美主体的情感。在行文上古代游记多平铺直叙，而现代游记则会注意融合机巧的叙事和描写手法，更突出艺术作品的形式感。但是对一方面的偏重和强调并不等于否定另一方面。古代游记观念也会包含作者真挚的感情，也会涉及行文的考究；而现代的游记观念当然也不会否定游记的真实性和它的史料价值，否则就成了小说，而不是游记。

近代旅外游记便处在中国文学观念从古典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中国近代旅外游记一直都包含着真实性与史料价值。不过从晚清到五四，这些游记也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晚清旅外游记中出现了诸如桐城派风格的出使官员游记、富有小说笔法的王韬游记、具有政论色彩的康梁游记，等等。民初至五四，游记作者更加注重在游记中加大抒情的笔墨，其主体性增强，甚至很多作品表面上是记录旅途见闻，实际上却是借此表达自己的情感。纪实成了手段，抒情表现成了目的。这样的情况非常符合这个时期个体主体意识急剧凸现的社会文化思潮。旅外游记的这种变化展示了它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跨界。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去掉游记的纪实特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论是在古代的文学观念中，还是现代的文学观念中，旅外游记都同时具有文学艺术价值和历史史料价值，即它从来都是在文学和历史之间跨界的文类。

其次，以后现代理论来说，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区别不是本质性的。新历史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中，从叙事本身的虚构属性出发而认为历史文本实际上就是文学的。^①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绪论中讨论了历史文本和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问题。在他看来，历史文本永远不可能还原历史真实，因此历史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虚构。^② 这样的观念可以用于理解旅外游记中有关“西方形象”的问题。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了形象与想象之间的关

① 参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79页。

②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